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夫余兴亡史

范恩实◎著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uyu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工程

史余兴亡史

范恩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夫余兴亡史 / 范恩实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97-4150-4

I. ①夫… II. ①范… III. ①夫余-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9604 号

夫余兴亡史

著 者 / 范恩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2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150-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uyu

二说推之，涉与夫余皆源于乌裕尔河之名。”

(2) 在同意夫余统治阶层来自橐离的同时，进一步认为橐离也是秽貊的一支，即夫余兴起是秽貊内部不同支系相互结合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书中认为：战国以后，秽貊成了专指东北夷或东夷的称呼。今东北地区的松嫩、松辽平原，鸭绿江、辉发河、图们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北半部，皆有秽貊人在那里劳动、生息、繁衍。先后迁居东北地区的各支秽貊人，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原有的族称虽尚未消失，但随着社会进步，有些部落已分崩离析，演变为各有称号的部族集团。先后出现的名称有发、高夷、橐离、夫余、沃沮、高句丽、东秽。

(3) 田耘著《两汉夫余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不同意所谓夫余统治核心来自橐离的记载，“像出自‘旧志’之说当不可全信……这一问题单从文献记载上是很难作出结论来的”。

(4) 朝鲜学者李趾麟在所著《夫余考》（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2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后汉书》卷85《东夷传·高句丽》记载高句丽是貊族，认为与高句丽同族的夫余，无疑也是貊族建立的国家，同时，“貊”本作“北方”之意，故貊族可作“北夷”，于是，《论衡》中的北夷橐离国，便意味貊族国家橐离国。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夫余秽族说。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夫余史”（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夫余史》，顾铭学译、李云铎校，《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5年第4期）采用了相同的观点。

(5) 孙进己、张志立在《秽貊文化的探索》（《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一文中，根据白金宝——汉书下层文化与被认为包含貊族系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间的类似性，推断前者也属于貊族系统。由于学界一般认同白金宝——汉书下层与望海屯——汉书上层为橐离文化发展的两个连续阶段，这就为橐离貊族说提供了新的注脚。

(6) 董万仑不同意将夫余的族属与秽联系起来，他在《古代东方秽与貊研究的反思》（《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与《古代东方秽与貊研究的再反思》（《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两文中，全面辨析了学界以往有关

秽貊的研究，指出最初的秽仅是指分布在朝鲜半岛江原道地区的东秽以及咸镜道的沃沮，而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夫余分布地域原本是东夷人的地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汉代的古籍从未将夫余与秽貊联系起来，只是西晋成书的《三国志》和南北朝成书的《后汉书》模糊记载夫余始祖东明始建国之地为秽地，这实际上是古人“推当今以览太古”的历史观所造成的结果。

(7) 李炳海提出的夫余王为中土流人说可以说是与董氏观点暗合。在《夫余神话的中土文化因子——兼论夫余王解慕漱系中土流人》（《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中，他将朝鲜文献记载中传说的夫余王解慕漱与刘向《列仙传》中记载的瑕丘仲勘同，即夫余王解慕漱是中土流人瑕丘仲的化名，并进而认为有关夫余起源的种种神话传说既是北方文化、东夷文化的积淀，同时也是中土文化的传播。

(8) 杨军在《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主要根据史书记载夫余与豆莫娄为同一民族，而豆莫娄又被记载语与东胡系的室韦、库莫奚、契丹同，由此推测夫余先世当为鲜卑一支。夫余先世本为匈奴附庸，当西汉后期匈奴内乱之时东迁，征服秽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2. 橐离研究

关于夫余先世橐离国的地理位置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夫余族源与分布地域的讨论，因此也是相关学界关注的热点。据笔者掌握，目前主要有6种观点。

(1) 干志耿著《古代橐离研究》（《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一文认为，橐离地在今呼嫩平原，并进一步认为今肇源县境的白金宝文化，可能是橐离具有典型性的文化遗存。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原白金宝文化分布区内区别出白金宝——汉书下层、望海屯——汉书上层两个前后连续的考古学文化。韩国学者宋镐晷《见诸考古资料的夫余的起源和成长》（《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从存在时间的角度考虑，把望海屯——汉书上层比定为橐离文化更为可信。

(2) 张博泉著《夫余史地丛说》（《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一文从比定弱水为黑龙江出发，认为橐离在今黑龙江以北的俄罗斯境内。

(3) 王绵厚著《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一文,把东明南渡的“掩淲水”比定为今拉林河,因此推定曩离国故地应限定在今拉林河和东流松花江之间的松江平原东部、张广才岭以西地区。并进一步将考古发现的黑龙江省中部拉林河和东流松花江南北之间的宾县庆华古城比定为曩离国故地。

(4) 孙进己等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认为东明所经之掩淲水应为今东辽河,因此曩离之南界当到达今东辽河流域,而其北界则当在今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

(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认为,曩离即《好太王碑》中的北夫余,其地当在今齐齐哈尔以北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6) 王禹浪、李彦君著《北夷“索离”国及其夫余初期王城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一文,认为哈尔滨市所辖的松花江中游左岸与陵河交汇处的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可能是夫余初期建国的前身“北夷曩离国”的所在地。

3. 夫余的疆域与王城

有关夫余的疆域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影印本)引丁谦观点:“夫余部地,在今吉林以西,凡长春双城五常宾州及伯都纳(今扶余县)阿勒楚克(今阿城县)等城皆是。”不过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这样一个分布范围:东近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壤,西至今吉林省双辽至白城一线与鲜卑为邻,北达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南抵辽宁开原市北(以上参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版本同前引),东南则到今辉发河流域与高句丽接壤(此据〔日〕池内宏《夫余考》,王建译,刘凤翥校,《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

相对来说,有关夫余中枢所在,即夫余王城的地理位置则有着更多的争论。主要观点如下。

(1) 池内宏著《夫余考》(版本同前引)一文,从夫余盛产黄金为出发点,认为:夫余兴起于阿勒楚喀地区(阿什河流域,产金),因此其初期王城所在的鹿山也应在这—地区。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在慕容廆军队的打击下,又曾一度迁往北沃沮地区(今吉林珲春)。以后《资治通

鉴》所谓受百济所侵（池内氏以为当为高句丽），西徙近燕，当系迁至今吉林农安地区。

（2）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版本同前引）一书，认为夫余国初都于今吉林农安附近，正为辽金时代之黄龙府，其后为高句丽所侵，不得已而西南徙，居于今之四面城（在今昌图县北 20 公里），即为后来之扶余城，通鉴所谓西徙近燕，即指此也。

（3）日野开三郎著《东洋史学论集》第十四卷《东北亚民族史（上）》（东京：三一书房，1988）一书，认为夫余初都之地在今吉林农安，285 年在鲜卑军队的打击下，先迁往北沃沮地区，后在西晋武力护卫下还复旧都，但迫于鲜卑的压力，东迁鹿山，鹿山则在今吉林市附近。以后又因为百济（高句丽）的压迫，再度西徙近燕（迁回农安）。

（4）王绵厚著《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夫余初都之地当在松花江中游的吉林龙潭山或东团山一带，而西徙近燕的夫余王城应为今辽宁西丰县城子山山城。

（5）李健才著《夫余的疆域和王城》（《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一文，所考证的夫余早期王城与王绵厚一致，但坚持西徙近燕之地仍应为今吉林农安。

（6）孙进己等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版本同前引）认为，夫余初建国之地当在今辽宁西丰岔沟及吉林辽源等地，高句丽大武神王五年（公元 22 年），此夫余为高句丽所灭，部分部众北徙才到达今农安及吉林市等地。

（7）王禹浪、李彦君著《北夷“索离”国及其夫余初期王城新考》（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发现于今黑龙江宾县的庆华堡寨遗址为夫余初都之所，而今吉林市的东团山南城子古城址则为夫余的前期王城，后者是夫余从初都之所由北向南沿张广才岭西麓和松嫩平原东部逐渐向吉林市迁徙，最后定都之秽城。

4. 夫余与北夫余、东夫余

除夫余一称外，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还出现了“北夫余”，朝鲜古代史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以及高句丽碑刻史料“好太王碑”中又有“东夫余”等名称，有关北夫余、东夫余的由来和地理位置的问题，中外史学

界的看法各有不同。

(1) 日本学者池内宏所著《夫余考》(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北夫余即最初的古夫余国,因位于高句丽北而称北夫余;东夫余则是在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前慕容廆破夫余,“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即逃到北沃沮时建立的。

(2)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版本同前引)一书认为,“好太王碑”碑文中“所谓东夫余,亦即晋书之夫余,非于碑称东夫余之外,又有所谓北夫余也”。

(3) 张博泉在《汉玄菟郡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了“四个夫余”说:第一个是“汉、魏、晋时的夫余”,又叫“《后汉书·东夷传·夫余》的夫余”,“《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夫余”,他认为在今呼嫩平原一带。第二个是“西徙近燕”而被慕容廆所攻拔的夫余,张先生一直强调这支夫余与《后汉书》卷85《东夷传·夫余》的夫余不是一部,地亦不同。他们西徙后的中心可能在今农安、长春一带,也就是后来高句丽的扶余城所在,渤海于其地置扶余府。随后在1981年出版的《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个夫余西徙以前本来在“接近乐浪”之地。第三个是“北夫余”,张先生说它是第一个夫余的先世所自出,其地在纥升骨城即今辽宁桓仁一带。第四个是由“北夫余”的一支迁出到迦叶原地方为“东夫余”。

(4) 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一书,认为北夫余即曷离,也即后世之豆莫娄、达末娄,与东明南下建立的夫余国不同,并将其比定在今东流松花江以北的呼嫩平原。

(5) 杨军著《东夫余考》(《史学集刊》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东夫余是夫余早期发生分裂过程中,一支迁徙到朝鲜东海岸而形成的,该部出现的时间很早。有关这个东夫余的记载出自朝鲜古籍《帝王韵记》、《三国遗事》等书,实际上是高句丽始祖朱蒙所出之地,只是因为公元5世纪东夫余已沦为高句丽附庸,因此高句丽王室不愿承认出自东夫余,转而将祖源进一步上溯到北夫余。

(6) 对于上述“多夫余说”,林沅(《夫余史地再探讨》,《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李健才(《三论北夫余、东夫余即夫余的问题》,收入李

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第三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均做出了系统的反驳。例如李健才明确指出：北夫余即夫余，不是夫余之外还有一个北夫余；东夫余即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亦即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

从以上夫余史地考证的研究状况看，由于有关夫余的文献记载相当匮乏，因此造成了较多的学术争论。但随着研究的展开，特别是考古材料的大量出现，学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正逐步达成一致。

（二）考古发现

从事夫余考古文化研究的早期重要学者是李文信，1949年以后，在张忠培、林沄等老一辈学者的带动下，夫余考古取得了全面的进展。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可供参照的文献记载严重不足，因此在夫余考古文化的比定方面也存在着一一定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王亚洲著《吉林农安坨子遗址的发现与初步调查》（《吉林大学人文学报》1958年第3期）一文，认为“红衣陶”是夫余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它的分布范围大致是北起肇源、宾县，南至长春、吉林一带，东至宁安牡丹江中游，西到长岭一带的松嫩平原边缘地区。

（2）王绵厚著《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以“红衣陶”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汉及汉以前的夫余文化。到汉魏时期，今松花江中游的吉林龙潭山或东团山一带，为夫余中心秽城所在，因此在吉林市东郊东团山山城和附近发现的周围长约2000米平地古汉城内出土的汉代遗物，以及吉林市帽儿山一带发现的有椁无棺的汉代土封木椁墓群应为汉魏时代的夫余文化。

（3）田耘著《两汉夫余研究》（版本同前引）一文，也将夫余考古文化分作两个时期，即辽宁西丰西岔沟文化为西汉时期夫余文化，而泡子沿类型是东汉时期夫余文化。赞同泡子沿类型文化是东汉时期的夫余考古遗存的还有马德谦（《夫余文化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和乔梁（《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以及日本学者田村晃一（《新夫余考》，〔日〕《青山考古》1987年第3期）、臼杵勋（《铁器时代的东北亚》，东京：同成社，2004）。

（4）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版本同前引）一书，

系统分析了夫余文化的来龙去脉，指出：源于昂昂溪文化的白金宝文化是夫余先世橐离考古学文化；以后由白金宝文化发展而来的肇源望海屯类型文化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北夫余文化。以陶鬲、陶豆和红衣陶为代表的北夫余文化，还分布于扶余杨家沟、长岗子，前郭旗红石砬子，长岭北正镇沙岭，长春红石砬子等地。集中发现红衣陶的地区，南到长春，西到长岭、富拉尔基等地，东到巴彦、汤原，北到绥滨等地，此应是北夫余和夫余的建国中心地区。吉林榆树大坡后岗古墓群（即榆树老河深墓地——笔者）则为汉魏时期的夫余文化的代表。

（5）林沅著《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收入《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一文，从分析老河深墓地入手，指出：在过去的考古调查资料中，以夹砂粗陶的圆形剖面桥状耳、高柱柄豆、钝头圆锥形鼎足为代表的遗存，在吉林市、永吉、德惠、榆树、蛟河、农安、双阳等地均有发现，尤以吉林市及其郊区发现最多。这类遗存被张忠培称为“文化三”，而在陈全家、徐光辉的调查报告称为“E类型”，实质上都是和老河深墓地随葬陶器同类的文化遗存。从这类遗存的年代、地理分布和文化面貌来看，定为夫余遗存无疑是合适的。同时，林沅对将西岔沟墓地归属为夫余遗存持怀疑态度，认为西岔沟墓地的文化面貌与属于鲜卑遗存的平洋墓地、兴隆山墓葬相同或很相近。

（6）郭大顺、张星德著《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则认为，泡子沿类型上承西团山文化，下启老河深类型，时代应在战国到西汉时期。长吉地区是西团山文化及其后续泡子沿类型的中心分布区，记“夫余”习俗“饮于俎豆”，与考古发现的泡子沿类型多豆相合。所以有学者将泡子沿类型等西团山文化的承袭者与夫余相联系，是可信的。又记夫余源于秽貊，都属东夷族，已可确定。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文化为与秽貊有关的文化，西团山文化与辽宁式曲刃短剑文化特征相近，分布地域相邻而互有交错，这应是秽貊与夫余这两个古族密切关系的反映。

（7）吉林大学李钟洙博士的博士论文《夫余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4）是夫余考古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该文将夫余历史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西汉初至西汉末，为夫余的形成时期；中期是东汉初至285年，为夫余的鼎盛时期；晚期是公元285~494年，为夫余的衰落时期。夫

余的境域早期只分布在北流松花江沿岸。中期，东以张广才岭和威虎岭为界；西以双辽至大安一线为界；南以龙岗山脉为界；北以嫩江和东流松花江为界。晚期只限于辽源市一带。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夫余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内容，进而探讨了不同时期夫余文化的特点。

从上述有关夫余考古文化的探讨来看，以榆树老河深墓地中层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应为汉魏时代的夫余遗存，但这一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与周边考古学文化间具有何种关联？以及与文献记载如何相互印证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如何将传统的类型学、层位学研究方法与族群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勾画出研究对象的生动的历史面貌，也亟待思考。

（三）社会发展史研究

早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夫余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如中国学者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版本同前引）第四章第二节，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夫余史”一节（版本同前引），朝鲜学者李趾麟所著《夫余考》（版本同前引）等。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著《东洋史学论集》第十四卷《东北亚民族史（上）》（版本同前引）“夫余考”一节的相关部分也属于此类研究成果。其中李趾麟认为：夫余的奴隶制，是在亚细亚式共同体崩溃情况下，身为贫民的下户与奴隶一起作为国家（或者国王的）奴隶而遭受役使的制度。此奴隶制是以亚细亚式共同体为基础的东方家内奴隶制（总体奴隶制）的发展形态，并且进入其崩溃的过程。

在具体分析方面，则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夫余国王

李趾麟《夫余考》（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在夫余，作为最高统治者，存在着国王。此国王并非行使无限制专制权力的国王，而是权力相对受到一定限制的国王。这是军事民主时代上层建筑的遗制。韩国学者宋镐晟《夫余研究》（《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2年第1期）一文，在同意夫余仍然不曾确立依靠王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同时，认为《三国志》时期的夫余社会，是从联盟体阶段向中央集权国家不断成长的过程。

其中夫余王权原则上稳定于父子相承，在对外方面也有一定的执行力。

2. 身份制度

李趾麟《夫余考》（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夫余作为官僚之最高者，有“牛加”、“马加”、“猪加”、“狗加”，其下存在着“大使”、“大使者”、“使者”。“加”可能是夫余语，与“汗”相同，大体是与国王氏族之同等氏族的代表。今中华书局本《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记载夫余“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李氏认为，当依“毛本”和“宋本”的记载，作“邑落有豪民、民，下户皆为奴仆”。其中“豪民”虽然也可能拥有奴隶，但除极有限的范围外，是不能拥有的，他们并非奴隶所有者贵族阶级而是“民”。与传统上认为下户是奴隶的观点不同，李氏认为夫余的“下户”不是奴隶，而是具有农奴形态，受着国王为首的奴隶所有者的奴隶性剥削的“民”。而《三国志》、《后汉书》在《东夷传·夫余》中记载的“奴婢”、“奴仆”才是真正的奴隶。

宋镐晟《夫余研究》（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在分化了的身份体制内，作为夫余之最高身份者，在中央有王，其下有以六畜定名的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和大使、大使者、使者等贵族。起初，“加”作为一定地区的族长由部族成员选出，随着部族社会的发展而贵族化了。其后在夫余，从诸加中变成国王直属官吏的大使职，具有很大权力，并逐步提高政治比重。受诸加统率的邑落，则分为豪民、下户两个阶层。平民中富裕了的上层变为豪民，一般民则成为下户。在下户的下面，存在着奴隶，包括征服奴隶、刑罚奴隶和债务奴隶。

韩国学者吴永灿在《见诸榆树老河深遗址的夫余社会》（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3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分析被学界确定为夫余遗存的榆树老河深中层遗址的墓葬材料，考察被葬者们的社会不平等是怎样显现于墓葬之中的；并通过对出现在老河深遗址中的随葬品遗物组合的分析，了解当时阶层化的进展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理解其性质。根据分析，作者认为榆树老河深中层遗址应该是夫余社会中豪民以上阶层的墓地。

在身份制度方面，学界的最大分歧在下户问题上。白南云著《朝鲜社会经济史》（东京：改造社，1937）一书，认为下户为古典奴隶；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通史》翻译组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一书，认为下户是处于奴隶地位的隶属农民；武田幸男著《见于魏志东夷传的下户问题》（〔日〕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3）一文，认为下户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小农类似，而其特点则是保留了强烈的部落共同体成员的特征——与邑落贵族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董万岭著《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则把下户区分为上层隶属农民和下层奴隶。

3. 地方统治

李趾麟《夫余考》（版本同前引）一文认为，夫余的东、西、南、北，存在着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汗国”，在其下面则是“邑落”。对它的统治，是由国王派遣的官吏——“汗”来进行。夫余国家的统治基础绝不是亚细亚式共同体；国家的统治对象也不是共同体，而是每个人。宋镐晟《夫余研究》（版本同前引）一文也认为，夫余把方圆两千里的庞大领土，分成东、西、南、北4个地区，并由“加”们管辖这些地区，而中心地区则由国王直接统治。

当然，对夫余社会性质的判断也有不同意见，例如易建平著《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专制酋邦与早期国家》（《史林》2004年第1期）一文，就提出了夫余是酋邦社会的观点。

现在看来，上述研究更像是一系列既有概念的串联，至于这些概念是否具有普世性，对夫余史而言是否有足够的史料证据，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因而其学术价值也是很难高估的。

此外，一系列有关高句丽统治体制的研究，如国内学者杨军、高福顺，日本学者武田幸男，韩国学者金哲垞等的论著，对于理解夫余统治体制极有助益，只是这种比较研究还没有十分成功的范例。

总的说来，与史地考证相比，社会发展史研究远远没有深入展开，特别是国内学界在这方面更为薄弱。同时，由于与相关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理论发展相脱节，许多研究结论尚有待进一步修正。

二 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

从上文的学术史回顾不难看出，以往有关夫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系

族源、历史地理等方面，这些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就夫余史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东北地区最早进入国家阶段的政治势力之一，它的兴起历程、政治结构特征，甚至其衰亡，都是地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对探讨地区史发展进程，华夏边缘历史族群的互动关系，区域后起族群政治结构特征等问题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也可以说，只有真正厘清夫余政治兴亡史，才能准确把握有关其族系族源、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夫余政治兴亡史。

本研究第一章为“夫余国家起源研究”。其中首先分析了夫余兴起的历程。“东明自橐离国南下，都王夫余之地”是有关夫余兴起历程的唯一史料记载，以往学界也多据此论证夫余统治核心源自北夷橐离国。然而，这一记载明显是一则始祖神话，因此其史料价值不能不令人怀疑。在本章中，笔者通过对夫余考古文化的追本溯源，一方面否定了夫余统治核心自北而来的观点；同时，进一步明确夫余兴起是在西团山文化所属人群的基础上，在中原燕、秦、汉文化北进的推动下最终完成的。最后，笔者借助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评估了“东明神话”的史料价值，判定它是夫余社会通过虚构“君权神授”的“历史”确立其王权的正统性，从而实现对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肯定的工具。

由于史料记载将高句丽的族源（或统治核心力量）追溯至夫余，且记载的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夫余始祖神话大同小异，而从时间线索上看，高句丽后夫余而兴，并最终代替夫余成为华夏东北边缘的最强异族，因此，从深化对夫余兴起历程理解的角度出发，本章也探讨了高句丽的兴起历程。

以往学界多根据文献记载探讨高句丽勃兴史，但由于相关文献极其贫乏，且多晚出，因此效果并不理想。笔者借鉴考古学界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研究的理论方法，从考古材料入手进行了新的考察，并得出以下结论：高句丽兴起是今吉林通化、桓仁地区土著文化自主发展演进的结果。该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步入文明发展的轨道，渐次演进，至战国末西汉初实现飞跃，进入酋邦阶段，从而为进一步向国家演进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周边文化，主要是辽东地区、吉林东丰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外来影响范围有限，从未成为主导力量。由此也否定了以往学界依文献的只鳞片羽把高句丽兴起的历史拉长到商周之际，抑或与先秦时期辽

东地区相对发达的考古文化相联系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东北地区早期国家兴起的问题，本章还讨论了辽东石棚的渊源问题。石棚是辽东地区史前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长期为相关学界所关注。但由于石棚属地上建筑，极易遭到破坏，历经数千年后，石棚内很少出土遗物，因此相关研究争议颇多，有关辽东石棚的渊源问题即是其一。与以往学界多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石棚形制渊源不同，本研究选取石棚考古文化作为新的切入点，其结论为，在辽东石棚分布的核心区存在着两类与石棚有关的考古文化，即石棚文化Ⅰ、Ⅱ。其中石棚文化Ⅰ年代大约在商代；石棚文化Ⅱ则与学界熟悉的双房类型为同一考古文化。从而解明辽东石棚在商代即已出现，是石棚文化主人的独立创造发明，是其社会演进的重要标志。同时，本研究也从相关考古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辽东石棚与朝鲜半岛支石墓的关系，指出是前者影响到后者的形制演变而不是相反。

在进行了上述三项基础工作以后，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比较分析了华夏东北边疆历史族群夫余、高句丽的国家起源历程，论证华夏文明的影响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铁农具为代表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输入是夫余兴起的动力；而西汉玄菟郡的设立则推动了高句丽的兴起。而且，正是因为国家起源道路的不同，导致两者的国家组织具有了一系列不同特征：前者军事实力不强，国王权力受限，但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国家相对富有；后者则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重心集中在强化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上，军事受到重视，国王的统治权较夫余更为强化。

夫余兴起、鼎盛时期，正值中原两汉时代，夫余与两汉政权的关系，不但关涉两汉的东北边疆政局、夫余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发展进程，而且影响到中原史家对夫余的认识，也即两汉史料中有关夫余记事的准确性问题。但是，由于相关史料极度贫乏，以往学界对夫余与两汉政权关系的把握难称允当。为求有所突破，本研究第二章开拓思路，选取了三个侧面视角考察“夫余与两汉政权”之关系。

其一，“西汉玄菟郡辖区考”。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其中玄菟郡在两汉时期东北地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汉政府通过玄菟郡与夫余发生联系，而到东汉时期，夫余更成为玄菟郡属国。然而由于史料的贫乏，相

关研究争议较多且进展缓慢。笔者着重讨论西汉时期的第一、第二玄菟郡的辖区问题：在全面分析相关史料记载的同时，又从第一玄菟郡的设立、管理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入手，判断第一玄菟郡以沃沮之地为核心，即今朝鲜东海岸背山向海之平原。汉昭帝时期，由于夷貊侵扰玄菟郡，汉于元凤五年（公元前 76 年）出兵控制貊人地区，并于第二年在新控制地区，即今浑江、鸭绿江流域建城设治，是为第二玄菟郡。至于第一玄菟郡之地，由于夷貊侵扰而残破，大部罢去，只以原郡治所在之最大邑落沃沮为县——“夫租”，归属乐浪。当然，或许还有一部分，如西盖马县是由第一玄菟郡转入第二玄菟郡的。

其二，“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西岔沟墓地是东北地区发现的重要汉代遗存，但有关其族属的判定迄无定论，一说当为夫余遗存。本研究利用匈奴、鲜卑、夫余等族考古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参考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论证西岔沟墓地及其附近的类似遗存是汉武帝时期内迁辽东塞外的乌桓遗存。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西岔沟墓地的文化渊源，探讨了乌桓与东胡、乌桓与鲜卑的文化关系，并对以往学界探索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其三，“论两汉的东北边疆政策”。目前学界通说，据《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结秽貊、朝鲜、真番之利。”认为至晚到汉武帝时期夫余已为中原所了解。然而通观《史记》、《汉书》等西汉史料，对夫余的记载均寥寥无几；而有限的记载，又无一涉及夫余之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处，难免让人有雾里看花之感。原因何在呢？根据笔者梳理，西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主要采取保塞政策，其中“彭吴穿秽貊、朝鲜”与汉武帝伐灭朝鲜，皆事出偶然，非既定扩张政策的推行，因此都事竟即止，没有进一步向东北腹地延伸。直到汉昭帝时期，东北四郡格局调整，以今天通化、桓仁地区重新设立玄菟郡，汉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仍未越过今吉林哈达岭、龙岗山脉。加上夫余以农业立国，“不寇钞”的国家特征，西汉时期与夫余发生官方往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而西汉时期对夫余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到东汉时期，由于夫余自身的发展，开始积极参与东北地区政治事务，不断与东汉政府发生联系，“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